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汉墓

蒋璐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自古就是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接触地带。这一地区已发现的汉代墓葬可以分为四期, 从西汉早期延续到东汉早期。就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来看, 同中原地区发现的同期墓葬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仍能看到一些地方特色, 并受到了秦文化及当地文化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 鄂尔多斯地区 汉代墓葬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鄂尔多斯地区位于黄河南岸, 南接古长城, 北、西、东三面临黄河, 是中原农业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发生融合、碰撞的前沿地带。自“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 略取河南地”^[1]以后, 该地区一直为中原王朝和北方匈奴交替控制。汉武帝时期, 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取得胜利, 将匈奴挡在阴山以北, 并在鄂尔多斯地区移民屯田戍边, 设置郡县, 分由朔方、五原、云中、西河和上郡管辖。东汉初期南匈奴降汉, 接收汉王朝的统治。鄂尔多斯地区大量汉代墓葬的发现即表明了汉代对北方地区的重点经营。本文是对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墓葬的纵向梳理。

文中所指鄂尔多斯地区参照《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2]一书(下文中若无特殊注明, 墓葬材料皆引自此书)的划定, 包括内蒙古乌海市和伊克昭盟全境, 墓葬材料包括书中发表以及杭锦旗乌兰陶勒盖墓地^[3]在内的 68 座汉墓。鄂尔多斯地区的汉墓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发现, 近年又有一些新的资料, 但多为简讯, 现将被认定为汉代的墓葬按发现时间先后列于后文^[4]。

1、1956 年, 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瓦尔吐沟清理了土坑墓 8 座, 除一座墓为曲肢葬之外, 余为直肢葬。墓葬内尸骨头顶大多有一个土龕, 内置陶罐和圜底釜。墓中出有陶灶, 双耳铁釜, 铁剑, 铎铃, 五铢钱等。年代在西汉时期^[5]。

2、1957 年, 鄂托克旗发现 300 多座墓葬, 墓砖是小型灰色, 地面散布绳纹灰陶片。发现釉陶器、陶盆、陶罐、铜镜等, 初步认定是汉墓群^[6]。

3、1958 年, 郡王旗(今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红庆河古城附近零散分布有古墓, 皆为砖室墓, 子母砖券顶, 随葬绳纹陶罐、铜印、布币和“大泉五十”^[7]。年代应该也在汉代。

4、1996 年, 在东胜市潮淖梁乡发掘了 8 座墓葬。5 座土坑竖穴墓, 设生土二层台, 无棺, 单人葬。随葬器物有陶壶、敛口直沿罐, 小口罐等。另有 3 座长斜坡墓道土洞墓, 双人葬。发掘者认为年代应该在两汉时期^[8]。

5、1999 年, 鄂托克旗乌兰镇发现 6 座墓葬, 其中有 3 座东汉时期彩绘壁画墓, 内容有狩猎、放牧、整衣等^[9]。

另外, 在鄂尔多斯地区还发现大量少数民族遗存, 多被认定为汉代匈奴的墓葬。由于其文化面貌比较特殊, 与本文讨论的汉代墓葬在随葬品和丧葬习俗上有很大不同, 暂不将其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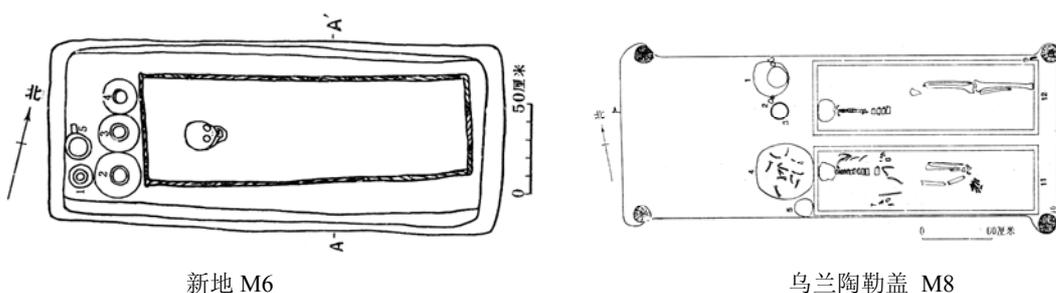
入本文进行分期和讨论^[10]。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所说的汉墓是汉族人的墓，或者至少是汉文化因素占主导的墓葬。

一、墓葬形制

这一地区的墓葬形制按构筑方法，可以分为 A、B 两型，A 型为竖穴墓，B 型为洞室墓。

A 型竖穴墓按是否有椁具，分为两式：I 式竖穴土坑墓，II 式为竖穴土坑木椁墓。

A I 式竖穴土坑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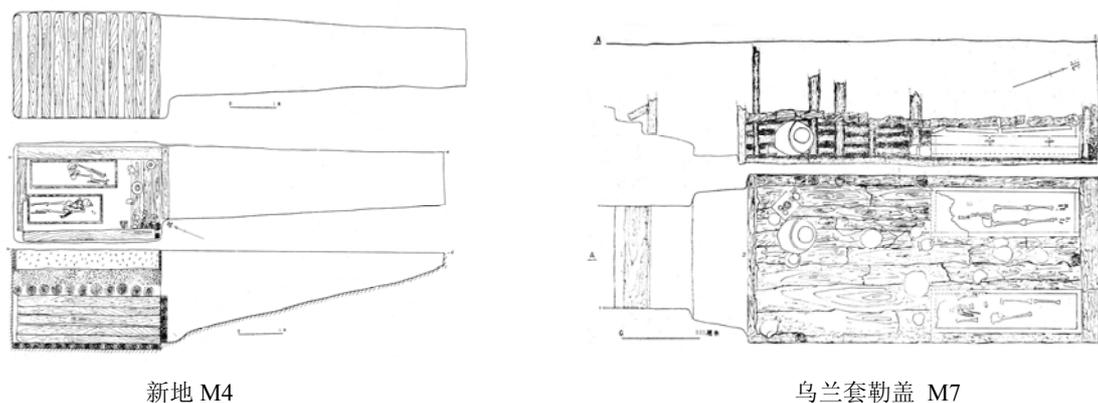


图一 AI 式竖穴土坑墓

平面呈长方形。新地 M6，墓壁斜直。在距墓底 0.5 米处的两侧壁各有一窄的二层台。有棺。早期被盗，仅剩一人头骨，随葬品置于棺西侧（图一，左）。

乌兰陶勒盖 M8，墓坑四角各有一半圆形柱洞，内立圆木。双人葬，一男一女，有棺，随葬品置于棺西侧（图一，右）。

A II 式竖穴土坑木椁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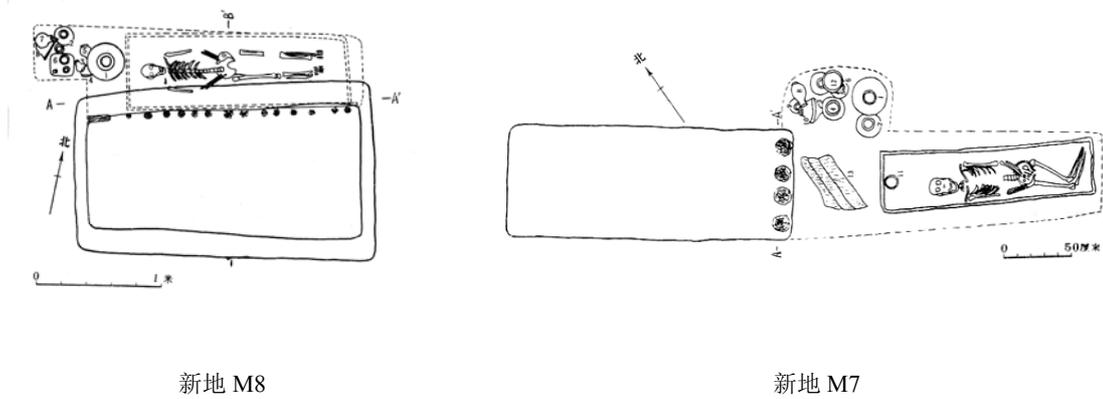
图二 A II 式竖穴土坑木椁墓

发现的两座皆有斜坡墓道。椁壁用方木或圆木垒砌，椁顶用圆木或半剖圆木搭就。新地 M4，墓室呈长方形，椁顶上面有 40 厘米厚的木炭层，其上还有 40 厘米厚的木炭加白灰层。双人合葬，随葬品放于墓室前部（图二，左）。乌兰陶勒盖 M7，斜坡式墓道，墓室平面呈凸字形，椁壁内侧有原木立柱。双人合葬，一男一女。随葬品放于墓室前部（图二，右）。

B 型洞室墓按墓道的结构可以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竖穴墓道洞室墓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这类墓葬全部为土洞墓。墓道的竖穴纵剖面多呈长方形，个别为长梯形。这种洞室墓有在竖穴长边一侧掏洞的，如新地 M8，洞室为弧顶。竖穴与洞室之间竖有一排圆木。单人葬，有棺。棺头端一侧有头龛，内置随葬品（图三，左）。另有一种在竖穴的短边一侧掏洞，如新地 M7，长方形竖穴，直壁。洞室为弧顶。洞室口立有四根圆木。单人葬，有棺。棺头一端有侧龛，内置随葬品（图三，右）。



图三 Ba 型竖穴墓道洞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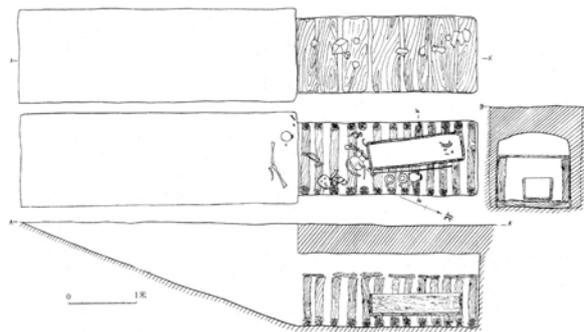
Bb 型，斜坡墓道洞室墓

按洞室的建筑材料又可分为两式，

Bb I 式，土洞墓

其中仅有一例土洞木椁墓，即新地 M5，其余都无椁具。

新地 M5，墓室为弧顶，底部横铺一层圆木，两侧壁各竖立一排圆木，椁顶盖有木板，上散置石块。椁室内置一长方形棺（图四）。



新地 M5

图四 土洞木椁墓

三段地 M15，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单人仰身直肢葬，有棺，随葬品放在墓室靠近墓门处（图五，左）。

三段地 M21，墓室平面呈凸字形，拱形顶，单人葬，死者为一男性，有棺，随葬品置

于墓室前半部分（图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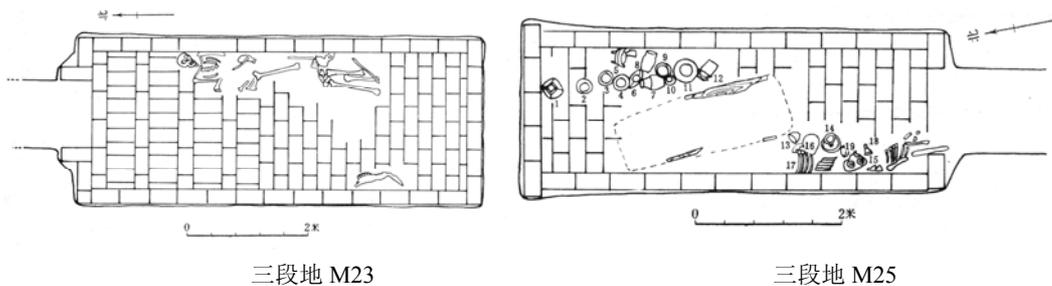
乌兰陶勒盖 M6，由墓道、主室、耳室三部分组成。主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顶呈拱形。耳室在主室北端东侧，平面呈长方形，内有少量随葬品。墓底近中部修有二层台，上置木棺。单人葬，男性。该墓早期被盗，随葬品散落于墓室中（图五，右）。



图五 Bb I 式土洞墓

Bb II 式，砖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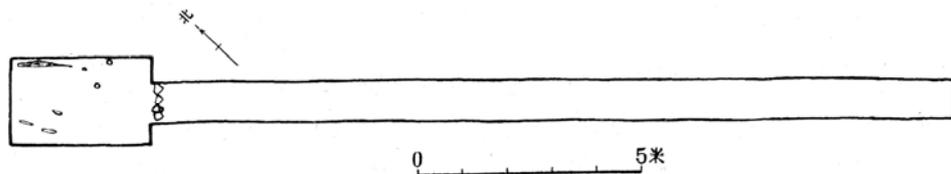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这种墓葬形制多见于三段地。三段地 M23，拱形顶，单人葬，少见随葬品（图一-2，12）。三段地 M25，单人葬。随葬品主要摆放于墓室后部靠东壁一侧，和墓室前部靠西壁一侧（图一-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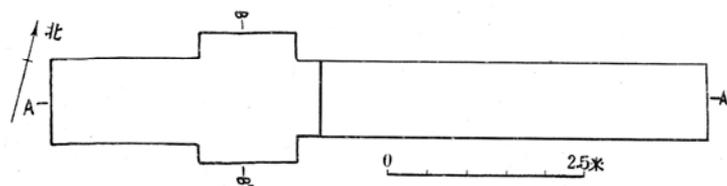
图六 Bb II 式砖室墓

另外，在斜坡墓道洞室墓中有一种石洞墓，形制比较特殊。如凤凰山的 13 座墓葬，墓室大多开凿在岩层上，无坟冢。长斜坡墓道，墓门多用红砂岩块封堵。墓室平面多长方形。墓顶多硬山式。如凤凰山 M3，双人合葬，有少量随葬品。此类墓葬形制在凤凰山墓地占大多数（图七，上）。凤凰山 M12，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前室较宽，顶略弧，后室为弧顶。墓内残剩一具人骨，不见随葬品。

在乌审旗发现的昂拜淖古墓有“就平地的岩石层穿凿墓室的葬式”，应该也同于凤凰山的墓葬形制，受材料所限，不能判定其年代^[1]。这类墓葬的墓室虽为岩石构造，但形制同土洞墓类似，如凤凰山 M12 同三段地 M21 的形制相同，应是当时人们因地制宜的一种做法。



凤凰山 M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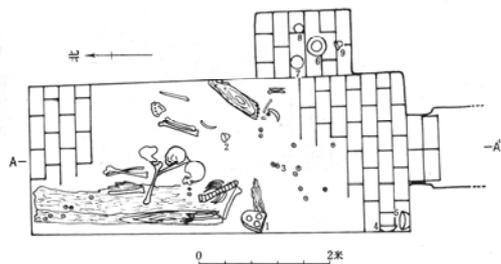


凤凰山 M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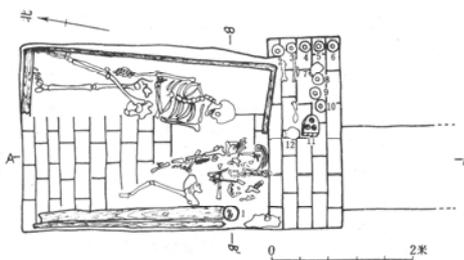
图七 石洞墓

在三段地还有砖底土洞墓和砖室木顶墓。

砖底土洞墓仅墓底铺砖，墓室大部分仍为土洞。例如三段地 M11，长斜坡墓道，墓底横向错缝平铺条砖。墓室东壁靠近墓门处设一壁龛。壁龛底部亦平铺条砖。男女合葬，木棺靠近墓室后部西壁。该墓早期被盗，随葬品散落于墓室各部分。用条砖和子母口砖封堵墓门，纵向立砌（图八，左）。三段地 M12，长斜坡墓道，墓底横向错缝平铺条砖，壁龛底部亦平铺条砖。单人葬，女性。有棺，随葬品放于墓室东壁的壁龛内。该墓经过二次扩建，扩建后的墓室不大规整，墓底亦未铺砖。二次葬为一老年男性，面向女性，仰身直肢。用条砖纵向立砌封堵墓门（图八，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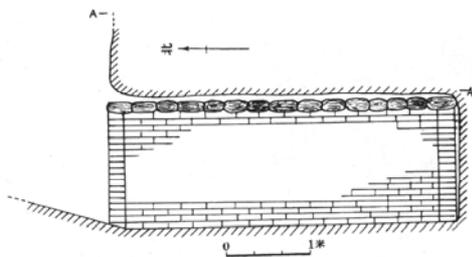
三段地 M11



三段地 M12

图八 砖底土洞墓

砖室木顶墓的墓室底部和侧壁用砖砌筑，顶部用横木搭就。例如三段地 M24，斜坡墓道，墓室平面略呈梯形。双人合葬，随葬品摆放于墓室前部靠墓门处，用条砖竖向双排封堵墓门（图一-2，11）。



三段地 M24

图九 砖室木顶墓

从墓室的建筑构材考虑，上述的砖底土洞墓可以视为土洞墓和砖室墓的“中间类型”，将其划入 Bb I 式斜坡墓道土洞墓。而砖室木顶墓亦可能是砖室墓发展中的“变体”，也可能是受木椁墓影响的产物。因为墓室大部分仍由砖构成，将其划入 Bb II 式斜坡墓道砖室墓。

二、随葬品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汉墓随葬器物，按质地可以划分为：陶器（包括泥质陶和釉陶器），金属器（包括铜器、铁器）、其他（包括漆木器和玉石器）等。

大部分墓葬中都随葬有陶器，尤以泥质灰陶为大宗。器形主要有罐、壶、灶、仓、博山炉、井、碗、盘、盆等，部分墓葬还随葬陶俑和动物俑。泥质陶器的发展序列相对完整，是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材料。釉陶器仅见于凤凰山 M5、M6、M11 和乌兰陶勒盖 M6、M9。全部为黄釉陶，器形有罐、鼎、壶、盘、仓、灶、井、博山炉、碗等。

铜器主要包括车马器、铜钱、铜镜，其中铜钱和铜镜是断代的主要依据。汉代的手工业发达，并出现了专门化的生产，例如铜钱作为流通的货币，从中原到边疆，形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本文参照中原相对完整、研究较深入的铜钱和铜镜发展序列来判定鄂尔多斯地区墓葬年代的前提条件。铁器在这一地区发现数量不多，有铁剑、铁刀、铁釜，由于锈蚀严重，仅能分辨出基本的器形。

漆木器数量也不多。在 68 座墓中，有 12 座墓随葬有漆器，乌兰陶勒盖 M7 随葬有 7 件。但发表的材料中仅能见到漆盘和耳杯两类，其他器类因不易保存，能辨认的较少。在新地的个别墓葬中，还存在随葬桦树皮箱、桦树皮器的现象。玉石器主要是装饰品类，如琉璃珎、玛瑙珠等。

下文主要介绍陶器中有代表性的类型：

陶罐 按颈部高低、腹部形状和器形大小分三型。

A 型罐：高领，弧腹，器表多施弦断绳纹。

新地 M7：8，尖唇，沿面有凹槽，直领微弧，溜肩，弧腹，平底。口径 13.1，高 27.5 厘米（表一，1）。

新地 M2：5，尖唇，宽沿近平，直颈，肩部稍鼓，平底。口径 10.9，高 23.4 厘米（表一，3）。

新地 M6：2，圆唇，弧颈、鼓肩，下腹斜收，平底。口径 12，高 31.5 厘米（表一，11）。

B 型罐：矮领，耸肩，腹部较 A 型微鼓，多施弦断绳纹。

新地 M7：1，侈口，领微弧，肩微隆，鼓腹，平底。口径 11.9，高 26.7 厘米（表一，2）。

新地 M2：1，钝方唇，侈领，溜肩，鼓腹，平底。口径 12.2，25.3 厘米（图二，4）。

新地 M4：2，口沿外卷，弧领，长溜肩，鼓腹，平底。口径 13.4，高 29.7 厘米（表一，22）。

C 型罐：相对 A、B 型罐，体形较小。腹最大径大约器高，略呈扁体。

新地 M11：9，小口，直领，肩部钝折，鼓腹，平底。肩部饰弦纹带一周。口径 8.2，高 13.4 厘米（表一，5）。

鲁家坡 M1：2，侈沿，广肩、鼓腹。中上腹饰数周凹弦纹，凹弦纹间压印有短线。口径 10.4，底径 10.2，通高 16 厘米（表一，12）。

新地 M4：4，外迭沿，鼓肩，下腹曲收。平底。肩部饰弦纹带一周。口径 9.4，高 12.4 厘米（表一，23）。

壶 按壶口形状和器形可以分以下三型。

A 型壶：盘口。

新地 M5：2，盘口，直颈，鼓肩，鼓腹，假圈足较高，平底腹部饰一周凸弦纹。口径 13.2，高 24.3 厘米（表一，13）。

新地 M3：1，盘口加深，直颈，溜肩，鼓腹，假圈足内收，平底，底部凿一圆孔。颈下、腹部各施两周弦纹带，腹部对称饰二衔环铺首。口径 12.8，高 26.5 厘米（表一，14）。

凤凰山 M10：3，盘口较深，束颈，溜肩，鼓腹，腹部最大径较前二者有所下移，假圈足。肩部有两道凹弦纹，肩部有彩绘的卷云纹和网格纹。口径 8，高 19.7 厘米（表一，24）。

B 型壶：喇叭口。

三段地 M21：2，口微侈，矮领，弧腹。口部外有一周凸棱。口径 9.2 厘米，底径 8.4，高 21.5 厘米（表一，6）。三段地 M21：3，鼓腹。口径 10.4，底径 8，高 20 厘米（表一，7）。

三段地 M7：1，喇叭口略呈盘状，高领，鼓腹。颈部有一周弦纹，腹最大径处有三周弦纹。口径 11，底径 10.4，高 21 厘米（表一，15）。

三段地 M2：1，喇叭口，束颈，高领，鼓腹，小平底，器身修长。颈部靠下饰一周弦纹。口径 8.4，底径 6.5，高 22 厘米（表一，25）。三段地 M2：2，口径 10.4，底径 8，高 20 厘米（表一，26）。

C 型壶：扁壶，腹横截面呈梭形。

在该地区的汉墓中仅见于三段地部分墓葬，具有地方特色。

三段地 M21：1，直口，圆唇，溜肩，鼓腹，椭圆形平底，口部外侧有一周凸棱。口径 7.2，底径 9.6，高 20.4 厘米（表一，8）。

三段地 M25：6，侈口，圆唇，鼓肩，弧腹，口径 6.8，底径 11，高 23 厘米（表一，16）。

三段地 M2：6，小圆口，圆唇微侈，溜肩，坠腹。椭圆形假圈足。口部外侧有二周凸棱。口径 6.5，底径 9.2，高 25.2 厘米（表一，27）。

瓮

三段地 M9：1，直口，广肩，扁鼓腹，肩部泥条带上拍印绳纹。口径 18.5，底径 21.6，高 33 厘米（表一，9）。

乌兰陶勒盖 M7：5，口微侈，溜肩，鼓腹，肩部压印一周回字纹，腹下部压一周菱形折线纹，肩部及腹部有磨光暗纹。口径 20.7，腹径 43，高 38.7 厘米（表一，28）。

灶 按灶平面形状，分成 A、B 两型：

A 型，灶面呈方形。

新地 M2：7，灶面呈长方形，上置一大二小罐装釜，釜与灶连为一体。烟从位于灶后

侧（表一，10）。

乌兰陶勒盖 M7：7，平面呈长方形，由灶身、灶面、灶门、火眼、釜、甑、烟囱等组成。灶身外涂一层白衣。灶宽 26.3，高 29.3 厘米（表一，28）。

B 型，灶面呈长半椭圆。

新地 M5：3，三个釜眼，釜与釜眼分离。一烟囱孔，灶门位于中间，长方形。灶长 21.9，宽 17，高 8.6 厘米（表一，17）。

新地 M3：5，三个釜眼，釜与釜眼分离。烟囱呈柱状，有方座。近烟囱侧的釜挂黄釉。灶口壁呈斜面状，长方形灶门。灶长 19.9，宽 16.6，高 6.5 厘米（表一，18）。

新地 M4：10，三个釜眼，釜与灶体连接。灶面模印有刀、勺、钩、叉、盘等庖厨用具。灶门为小长方形。灶长 17.7，宽 18.2，高 9.4 厘米（表一，30）。

仓

三段地 M7：3，方唇，小直口，矮直沿，斜肩出棱，直腹，平底，素面。口径 5.6，底径 14.4，高 20 厘米（表一，19）。

三段地 M27：4，形制基本同上一件，仅下腹斜收，呈斜直腹状，平底较小。口径 6.8，底径 11，高 18 厘米（表一，20）。

新地 M4：3，半圆形顶，顶尖有一小圆钮，上有小尖。直筒形腹。腹部饰二道凹弦纹。通高 20.5 厘米（表一，31）。

博山炉

三段地 M7：10，炉身略呈豆形，口稍敛，浅弧腹，内裹底，实心柱状柄，下连平折沿浅腹大平底作撑托，炉盖上有镂孔。炉身于盖合呈卵形，托盘底径 13.6，通高 20 厘米（表一，10）。

新地 M4：6，为博山炉座，子母口微敛，平底，柄较细，中空，托盘浅腹弧壁，底盘空，素面。口径 8.5，高 9 厘米。器型较小，可能为明器（表一，32）。

三、分期与年代

本文引用的分期材料以新地和三段地为主，依据随葬典型陶器形式及组合变化，结合共存的断代器物，并参照相邻地区汉墓序列进行类比分析，将该地区的汉代墓葬分为四期。

第一期：新地 M1、M7。两座墓均为 Ba 式洞室墓，单人曲肢葬。随葬品有罐、鼎、釜、甑等。新地 M1 随葬的陶釜，形制同陇县店子秦代墓葬中的 III 式陶釜类似^[12]，但陇县店子秦墓中的陶釜多为夹砂质陶，大部分纹饰施满腹部，而新地 M1：4 仅底部为夹砂质陶，且只在肩部饰绳纹，年代显然要晚于陇县的陶釜^[13]。新地 M1、M7 的曲肢葬可能是受到了秦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将第一期的年代划定为西汉早中期。

第二期：新地 M2、新地 M8、新地 M10、新地 M11、三段地 M9、M21。墓葬形制有 Ba 式洞室墓、Bb I 式洞室墓。新地 M10 为双人葬，其他为单人葬。随葬品主要是罐、壶、灶、瓮等。铜器有“半两”、“五铢”钱和铜镜。C 型罐的形制同山西朔县西汉中期的 I 3 式陶罐接近，但后者腹部没有弦纹^[14]。史书记载“半两”为秦钱，汉初更铸“榆荚”，后又铸“四铢钱”，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发行“五铢”^[15]。此后，五铢钱作为流通的货币一直延续

到东汉。新地 M10 中“半两”和“五铢”钱共出，且五铢钱的形制同洛阳烧沟汉墓中的第一型和第二型五铢形制类似，应该是武帝或者稍晚时期的^[16]。这一期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期。

第三期：新地 M6、M5，三段地 M25、M7，乌兰陶勒盖 M6，鲁家坡 M1。这批墓葬材料中仅见一组叠压打破关系，即新地 M6（A I 式竖穴墓）打破新地 M8（Ba 式洞室墓）。墓葬形制主要有 A I 式竖穴墓、Bb I 式洞室墓、Bb II 式洞室墓。全部为单人葬。随葬陶器组合主要是罐、壶、瓮、灶、仓、博山炉等。这一时期，A 型罐的腹部较上一期更鼓。C 型罐肩部由原先的钝折发展为鼓肩。C 型壶是三段地墓地特有的一类器物，这一期比上一期器身显修长，腹部呈弧形。乌兰陶勒盖 M6 随葬大量釉陶器，器类有罐、鼎、仓、井、盆、盘、方炉、魁等，并伴出有西汉武帝和平帝时期的五铢钱。一般认为铅釉陶器是汉武帝时期关中地区最早出现的^[17]。新地 M5 同山西朔县 VI1 式单墓道洞室木椁墓形制相似，后者出现在西汉晚期^[18]。综合以上因素，这一期大致相当于西汉晚期。

第四期：墓葬数量较多，以新地 M4，凤凰山 M1、M10，乌兰陶勒盖 M7，三段地 M2、M6 为代表。墓葬形制有 A II 式竖穴墓、Bb I 式洞室墓、Bb II 式洞室墓。新地 M4 木椁外有加木炭和白灰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山西朔县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墓葬中也有发现^[19]。这一期随葬陶器种类有罐、壶、瓮、灶、仓、博山炉、井等。凤凰山 M1 还随葬部分釉陶器。铜器有铜镜、铜钱“五铢”钱、“货泉”“契刀五百”。三段地 M6 出土两枚四乳四螭镜，形制同洛阳烧沟汉墓 V 型铜镜^[20]，后者的年代被定为东汉初期。另有凤凰山 M5、M6、M11 三座墓随葬釉陶器，器类有博山炉、罐、灯等，其中 M5 中的釉陶罐、釉陶灯同凤凰山 M10 的陶罐和陶灯形制相似，年代也应该相近，属于王莽至东汉初期。

四、小结

1、这一地区西汉早中期的墓葬发现有曲肢葬。曲肢葬在战国秦地及后来秦国的宝鸡、凤翔、陇县等地最为集中，通常认为是秦国流行的葬式^[21]。《史记·匈奴传》中记载：元狩二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汉书·食货志》在解释“秦中”时说，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并且“徙民充之，名曰新秦中”，其地理位置在今鄂尔多斯地区。可见关东地区的居民在秦和汉代时都曾迁到今鄂尔多斯地区。曲肢葬的存在说明了秦文化对鄂尔多斯地区西汉早期墓葬的影响。

从墓葬形制来看，竖穴土坑墓虽然见于西汉晚期，但是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汉代之前就大量存在，例如凉城毛庆沟^[22]、准格尔旗的玉隆太^[23]、杭锦旗桃红巴拉部分墓葬^[24]。到了汉代这类遗存中仍流行竖穴土坑墓，例如准格尔旗西沟畔汉代墓葬^[25]、东胜补洞沟^[26]。然而，在中原地区，进入汉王朝统治后，竖穴土坑墓日渐衰落，逐渐为洞室墓取代，并且结构日益复杂。有学者认为汉墓形制的这种转变同当时人们仿建地上建筑以及强调礼制为先，重视祖先祭祀有关^[27]。鄂尔多斯地区是汉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区，虽然随葬的罐、壶、仓、博山炉、井、灶等都是属于中原系统的，但是在墓葬形制上，仍维持着竖穴土坑墓的传统，这与汉王朝势力鞭长莫及有关，亦与该地区旧有传统的残余有关。

在这批墓葬材料中，三段地的汉墓表现出较多的地域特色。从墓葬形制上看，流行洞室墓，同中原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相同，只是少见后者多墓室和穹窿顶等复杂的结构。三段地的一些墓有随葬动物骨骼的现象，如 M7 发现猪、羊骨，M8 发现 4 具马头骨，M12 发现有鸡蛋、羊、猪骨，M21 发现鸡、牛、羊骨，M23 发现牛头骨，M25 发现鸡、羊骨。张海斌先生认为用牛、羊、马的头殉葬是汉代匈奴墓葬中流行的葬俗，而殉猪应该是汉代人的习俗^[28]，然而在三段地有共用猪、羊殉牲的现象。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一部分南匈奴归汉，殉牲可能是汉人受匈奴影响在丧葬习俗上的体现。在鄂尔多斯地区由于汉匈交错杂居，汉族人

和匈奴人的墓葬很难按照殉牲类别进行断然的划分。在上文提到的先秦时期的遗存中已有殉牲。汉代墓葬中这种现象仍旧存在，可视为是旧有的文化传统影响该地区汉代墓葬的另一种体现。因此可以说，在鄂尔多斯地区，即便在汉王朝代统治占绝对优势的时期，除秦文化的影响外，原先土坑竖穴墓及殉牲的习俗仍旧有所保持。

在墓葬形制演变上，洞室墓由土洞发展到砖室，并且出现了砖底土洞和砖室木顶墓这样的“过渡类型”，说明墓室构材的转变是一个逐渐和互相影响的过程，例如保留木顶的做法应是受到了木椁墓的影响。洞室墓以单室或者带耳室的为主，少见中原多室，穹窿顶的墓葬形制，发展不及中原地区充分，速度也较慢。

2、从陶器的器形演变上看，A型罐由溜肩发展到鼓肩，腹部最大径由中部上移至肩部。器表纹饰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多为弦断绳纹。B型罐腹部最大径下移。A型壶盘口逐渐加深，腹部最大径下移，到四期略呈坠腹状。B型壶口部外敞，器形更加修长。C型壶圈足加高，器形由圆鼓向瘦长发展。B型灶到晚期，表面模印上各种庖厨用具，更为形象生动。陶仓的顶部加高，呈半圆形。仓、井、灶应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器具，形制同中原地区的毫无二致。由此可见，虽然鄂尔多斯地区地处汉王朝代统治的边缘地区，但是汉文化的影响已经相当深入。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陶器体现出了一些地方特色。三段地的个别墓中随葬扁壶。这种类型的扁壶在宁夏盐池张家场^[30]、盐池宛记沟^[31]也有发现。张家场的扁壶有两个耳，易于悬挂和携带。另外有一些墓葬随葬中口直腹罐和小口罐，有些上面还有彩绘纹饰。这种形制的陶罐不见于其他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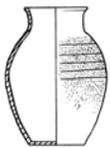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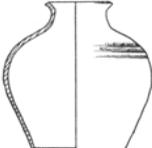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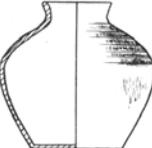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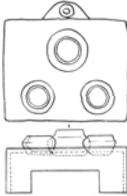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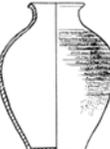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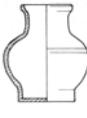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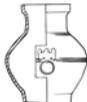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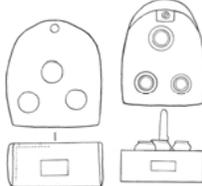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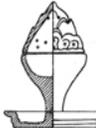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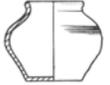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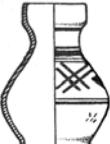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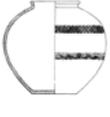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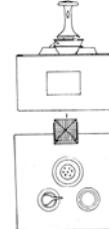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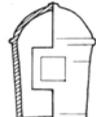
三段地M6随葬的一件陶俑很有特点。该俑直立，高鼻深目，八字胡，内穿长袍，宽腿裤，外披拖地披风，头戴尖顶风帽。与三段地M10陶俑盘发，身着右衽长袍的造型有区别，面部特征亦有所不同。盘发、身着长袍的造型在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陶俑中十分常见^[32]，应该是汉族人的着装习惯。三段地M6的陶俑也不同于客省庄M140^[33]青铜牌饰上的人物造型，后者皆披发，身着长裤。在磴口县的纳林套海^[34]出土有站在陶井旁的打水俑，头戴尖状风帽，小眼大鼻，另有一件头戴尖帽，蹲坐在井旁，可能同三段地的陶俑比较相似，这些俑表现的应该不是汉人的形象。

3、就各个墓地而言，之间也略有区别。新地和三段地的材料相对比较丰富，从陶器发展序列来看，新地以罐的发展最为完整，三段地A型壶的演变序列比较清晰。其它如乌兰陶勒盖和凤凰山的墓葬或是被盗扰，或是所出器物不具代表性，只能根据墓葬形制及为数不多的典型器物进行大致的分期断代。乌兰陶勒盖的一些汉墓同纳林套海汉墓在陶器特征上有较多的一致性，年代应该在西汉晚期。总体来说，新地属于西汉中期及以前的墓葬较多，墓葬形制以竖穴墓道洞室墓为主，保留较多秦文化的影响。三段地中斜坡墓道砖室墓较多，且很多墓葬中都出“货泉”，年代也晚些。两个墓地的随葬品组合也有一些区别，除了年代上的早晚之外，可能跟地域差别有关。

总而言之，鄂尔多斯地区的汉代墓葬从西汉早中期一直延续至东汉初期，东汉早中晚期的墓葬较少。早期受秦文化影响见有曲肢葬。受当地传统的影响，竖穴土坑墓消失得要比中原地区晚。砖室墓的发展较缓慢，出现了砖底土洞和砖室木顶墓等过渡类型的墓葬形制，少见多室及穹窿顶砖室墓。流行单人葬和双人葬，多人合葬的现象少。多数随葬品同中原同时期的器物差别不大，尤其是钱币和铜镜。但是仍有一些现象不见于中原地区的汉墓，表现出更多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部分墓葬随葬扁壶，殉牲以及陶俑。

目前发现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汉代墓葬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因为这一时期，汉王朝代出于军事需要，对该地区进行移民屯边。这些墓葬可能是迁入这个地区的汉族居民留

下的。凤凰山 M1 的壁画中有兵器陈设图和出行图，墓中出有弩机。这说明墓主人可能是当地地方长官，也说明汉代在鄂尔多斯地区的经营是以其军事目的为重。另外，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了大量汉代城址，多数具有军事防御性质，城郭的构造都在于强化城墙的防御功能^[35]。然而，东汉初期以后，国势日蹙，匈奴南下，朔方郡人口锐减^[36]，《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朔方代郡长史被杀，而后南匈奴又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寇掠并、凉、幽、冀四州”。因此东汉中期以后的墓葬在这里很少见。排除考古发现的不完全性和偶然性，东汉中晚期墓葬数量的减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局势动荡，人口减少。

	罐			壶			瓮	灶		仓	博山炉	
	A 型罐	B 型罐	C 型罐	A 型	B 型	C 型		A 型	B 型			
第一期	 1.新 M7: 8	 2.新 M7: 1										
第二期	 3.新 M2: 5	 4.新 M2: 1	 5.新 M11: 9		 6 三 M21: 2	 7 三 M21: 3	 8.三 M21: 1	 9.三段地 M9: 1	 10.新 M2: 7			
第三期	 11.新 M6: 2		 12.鲁 M1: 2	 13.新 M5: 2  14.新 M3: 1	 15.三 M7: 1	 16.三 M25: 6			 17.新 M5: 3 18.新 M3: 5	 19.三 M7: 3  20 三 M27: 4	 21. 三 M7: 10	
第四期		 22.新 M4: 2	 23.新 M4: 4	 24.风 M10: 3	 25 三 M2: 1	 26 三 M2: 2	 27.三 M2: 6	 28. 乌 M7: 5	 29.乌 M7: 7	 30. 新 M4: 10	 31. 新 M4: 3	 32. 新 M4: 6

表一：陶器分期表

注：表中“新”指新地，“鲁”指鲁家坡，“凤”指凤凰山，“三”指三段地，“乌”指乌兰陶勒盖。

参考文献

- [1] 史记·秦始皇本纪[M].
- [2] 魏坚. 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135 ~ 179.
- [3]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报告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1 (1): 36 ~ 49.
- [4] 因为这些简讯多为文字表述, 未附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线图, 故而年代判断较粗略, 待详细资料发表后还可做进一步讨论.
- [5] 李逸友.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河汉代文物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 (4): 29 ~ 32.
- [6] 汪宇平. 伊盟鄂托克旗西部发现汉墓三百座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 (8): 80.
- [7] 汪宇平. 伊盟郡王旗红庆河乡汉代古城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 (3): 81 页.
- [8] 李君平. 伊盟发现杜四圪旦墓地 [N]. 中国文物报, 1997 - 01 - 12 (1).
- [9] 王大方, 杨泽蒙. 鄂托克清理三座东汉壁画墓 [N]. 中国文物报, 1999 - 12 - 19 (1).
- [10] a. 宋远茹. 鄂尔多斯周边及中原地区的汉代匈奴文化分析 [J]. 考古与文物, 2001 (6): 75 ~ 80. b. 张海斌. 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0 (1): 14 ~ 22.
- [11] 张郁. 内蒙乌审旗的鄂尔多斯文化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 (5): 75.
-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 陇县店子秦墓 [R].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 [13] 另有一种报告中成为“釜”的器物, 如凤凰山 M8 : 4, 从形制和大小判断, 应该为灶釜.
- [14] 平朔考古队. 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1987 (6): 1 ~ 52.
- [15] 汉书·食货志 [M]
- [16]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 洛阳烧沟汉墓 [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 [17] 李知宴. 汉代釉陶的起源和特点 [J]. 考古与文物, 1982 (2): 91-95.
- [18] [19]同[14].
- [20] 同[15].
- [21] 韩伟. 试论战国秦的曲肢葬仪渊源及其意义 [A].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一)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204 ~ 211.
- [22]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毛庆沟墓地 [A].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27 ~ 305.
- [23] 内蒙古博物馆等.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 [J]. 考古, 1977 (2) 111 ~ 114.
- [24] 田广金. 桃红巴拉的匈奴墓 [J]. 考古学报, 1976 (1): 131 ~ 143.
- [25] a. 伊克昭盟文物站. 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1 (1): 15 ~ 27; b.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 西沟畔匈奴墓 [J]. 文物, 1980 (7): 1 ~ 10.
- [26]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1 (1): 27 ~ 33.

- [27] 黄晓芬. 汉墓形制的变革——试析竖穴式椁墓向横穴式室墓的演变过程 [J]. 考古与文物, 1996 (1): 49 ~ 69.
- [28] 张海斌. 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0 (1): 14 ~ 22.
- [29] 崔睿. 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 [J]. 文物, 1977 (5): 25 ~ 41.
- [3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 [J]. 文物, 1988 (9): 15 ~ 73.
- [31] 宁夏文物考古所, 盐池县博物馆. 盐池县宛记沟汉墓发掘简报 [A]. 宁夏考古文集 [C].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91 ~ 106.
- [32] 同[15], 图版叁拾玖 3、4、5.
- [3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沚西发掘报告 [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2. 139.
- [34] 同[2], 11 页
- [35] 周长山. 汉代的城郭 [J]. 考古与文物. 2003 (2): 45 ~ 55.
- [36] 侯仁之. 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 [A].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89.

Tombs of Han Dynasty in Ordos Area

Jiang Lu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Ordos area in Inner Mongolia has been the contacting region for agriculture and nomadic cultures from ancient time. Burials of Han Dynasty discovered in this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which last from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o early Eastern Han. Considering the burial custom and artifacts, there are litt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ombs and those discovered in Central Plain. Even though, after analysis, we can still find some reg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clues of influence from Qin culture and local traditions.

Key words: Ordos area, tombs of Han Dynasty

收稿日期: 2006-06-10

作者简介: 蒋璐 (1980-), 女 (汉族), 浙江兰溪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研究生。